关于白朗起义的几个问题

杜春和

白朗起义，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统治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它发生在河南的宝丰、鲁山一带，驰骋于豫、鄂、皖、陕、甘数省。起义军所到之处，斩关夺隘，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关于这次起义，史学界曾作过一些调查和研究，但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本文试就我接触过的一些史料，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白朗起义爆发的时间与迅速发展的原因

过去一些史书和论文，在谈论白朗起义时所引用的史料，大都是从一九一三年六、七月间，白朗起义军攻克唐县、禹州等地时开始的，在此以前的情况很少论及，特别是对白朗起义爆发的时间，都没有举出确切的史料来说明过。唯有河南开封师院历史系和河南历史研究所白朗起义调查组写的《白朗起义调查报告》中说：“武昌起义的同时，白朗起义的枪声也在宝丰打响了”。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下面再作一些史料补充。

据一九一二年五月，河南官方专门派人调查豫南一带农民武装活动情况的探报中说：“探确著名土匪杆首居里巢穴、快枪人数：

杜起宾，宝丰县西乡四十里韩庄人，巢穴在本庄东头路北，带七十五人，快枪七十五根。

牛天祥，宝丰县西乡四十里韩庄人，巢穴在本庄东头路南，带五十三人，快枪十八根。

李凤朝（一名红毛），郑县龙虎店人，巢穴在高皇庙，前日剿时即移住韩庄，带二十余人，快枪十四根。

白朗，宝丰县西乡二十四里大刘庄人，巢穴在本街，带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根。……”^①。

这份探报，是迄今所见到的当时官方文书中，最早有关白朗及宝、鲁一带各支农民武装情况的详细报道。它虽然还不能说明白朗起义爆发的确切时间，但却证明了白朗起义军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以前就已经开始活动了。

又据最近找到的一九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河南革命党人在开封办的《大中民报》发布的一条综合消息说：“鲁山杆首最著者有秦椒红、张金兰、李刘遂、岳宗仁、宋老年、张建德、冯心诚、高殿臣、李占元等。正月六日（农历，即阳历二月二十三日），鲁匪纠合汝、陕、宝之各匪薛套娃、李红毛、白狼、杜其宾各杆围攻城寨，凡十余昼夜，才退往城外三、五里外各乡。”五月十日，他们曾以“中华民国豫南军政府鲁县代调民军统领张”^②的名义，为筹饷安民事张贴布告于各乡镇。其内容要点：首先指出豫南绿林所以众多，完全是由于官商地主的残酷压迫剥削所逼起的。其次，具体规定军政府筹饷办法及行军纪律数条。

这则消息证明，白朗起义军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就同宝、鲁一带各支农民武装联合围攻过鲁山县城；同时也证明，白朗等各支农民武装，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形势下，自发的起而响应的。

从上述两条史料可以看出，白朗这支农民武装，在当时各支农民武装当中力量并不算大，但为什么唯独它能够迅速发展壮大，驰骋数省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其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白朗起义军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后，他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要复

① 《张镇芳存札》中所收1912年5月22日王汝桂致王祖同探报。

② 《白朗起义初期的一张布告》，《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1980年5月第5期。

辟封建帝制，便血腥镇压革命党和广大群众的反抗。河南地处中原，是进攻南方革命党人的重要战略基地。为了加强对河南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袁世凯派其表弟张镇芳任河南都督。张镇芳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上任后，立即对河南各支农民武装乃至进步的青年学生实行残酷的镇压，并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百计搜罗”的经济剥削。他从“加重丁漕、杂税、厘捐项下，按月协中央银五十万两。”^①致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各级地方官吏又都被袁系的大小爪牙所把持，这些人“贪利忘义”，“吸民膏髓者比比皆是”。^②因此，民国初年河南人民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比清朝尤甚”。一九一三年夏，据当时官方报道，豫南一带已呈现出“饥馑荐臻，十室十空，死亡流离，道殣相望，惨图手不忍绘”^③的局面。大批求生无路的饥民，纷纷揭竿而起，“千百成群，几成燎原”。“几于无处无匪，无夜无火，乱象尤以镇、内、召、裕、唐、泌六属为甚”。^④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因之更加高涨起来。这在客观上对白朗起义军的迅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其二，白朗拒绝招抚，提出“打富济贫”和举起反袁旗帜，是很得人心的。由于人民反抗斗争形势迅速发展，张镇芳派去镇压的反动军队常被打败，于是他又施展新的阴谋，指使担任“豫南剿匪司令”的河南陆军第三混成旅长王毓秀，改用“招抚收编”的诡计，诱骗各支农民武装首领就范。在敌人许以官职和金钱的引诱下，杜起宾等十多位首领，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一齐去鲁山“受抚”，结果被敌人全部杀害^⑤。但白朗却坚决拒绝了敌人的所谓“招抚”，表现出了他与众不同，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的英雄

① 《张镇芳存札》1913年7月8日张镇芳致袁世凯、财政部密电。

② 《时报》1914年3月30日。

③ 《张镇芳存札》1913年6月×日河南省议会鲁山议员杨仪山致张镇芳报告。

④ 《张镇芳存札》1913年7月10日王天佑致张镇芳报告。

⑤ 1912年10月23日张镇芳、雷震春致袁世凯、陆军部电中说：“昨据王毓秀由鲁山函禀，已于十八号将巨匪杜起宾、岳东仁、常建福、薛金标、张应朝、郭义德、薛三、高金保等设法擒斩，并捕杀党羽数名。……”

气慨，深受广大农民战士的钦佩和拥护。因此，在杜起宾等人被害后，他们的部众纷纷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只有几十人的农民武装，顿时增加到六、七百人。

敌人对白朗这支不受“招抚”欺骗，力量迅速发展的农民武装，又恨又怕，竭力进行镇压。面对这种形势，白朗认识到必须迅速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和敌人进行长期对抗。于是，在进行短暂的整军申纪之时，明确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号召广大贫苦农民参加。为了避开敌人的重兵围攻，于一九一二年冬，白朗率众离开宝、鲁，在东至京汉铁路的西坪、遂平、确山，南至湖北的随县，西至邓县、淅川一带的广大地区，来往流动作战，攻下许多寨堡村镇，到处宣传“打富济贫”。把收缴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等财产，分给贫苦人民。因此，到处得到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该匪以劫富济贫为唯一手段，故所至之处，贫苦小民均极欢迎，并乐为耳目”。^①到一九一三年春，白朗这支农民武装已发展到二三千人。

一九一三年夏，正当白朗起义军在豫南一带胜利发展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但由于他们脱离广大群众，深感自己力量的不足，因此，很想利用白朗这支现成的农民武装作为反袁的同盟军。于是，他们不断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派人到白朗军中来进行联络，或帮助策划军务。黄兴还在致白朗信中提出“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多毁铁道，使彼进路阻碍”^②等希望。白朗接受了革命党人联合反袁的要求。在进行“打富济贫”的同时，又提出响应“二次革命”的口号，^③竖起了“中原扶汉大都督”的讨袁旗帜。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白朗起义军连续攻克唐县、禹州等县城，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声威大震”。致使敌人惊呼：“豫省今日谈及匪首白‘狼’，其

① 《大自由报》1914年1月8日。

② 《大公报》1913年7月21日。

③ 雷震春在1913年7月5日致袁世凯、陆军部电中说：“白‘狼’谬假二次革命之说，互相号召”。

声势之炎赫，几令人胆落而魄惊。既破唐县，又窜禹州，鲁山几乎不保，近闻浙川亦又告警。虽然白‘狼’名实白朗，不过乡间一庄农耳。……此次祭祖回籍，约束甚严。旗上号称‘大汉付都督白’，一切举动回与前殊，不无谋士在内。然调集大军一二十营之多，团团驻扎，仍不能一鼓荡平”。^①

由于白朗起义军纵横驰骋，勇猛善战，不仅牵制了河南的反动军队不能去进攻革命党人；同时，还“破坏铁道”，切断了敌人的运输线，这就给“二次革命”以有力配合。因此，革命党人的报纸曾兴奋地报道说：“白‘狼’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②但是，当九月中旬白朗率众南下攻克湖北重镇枣阳时，“二次革命”的讨袁军很快都相继失败了。至此，白朗不得不放弃和革命党人联合作战的打算，又率众重返河南的宝、鲁一带，继续走自己的革命斗争道路。

资产阶级的反袁斗争虽然失败了，但白朗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反袁斗争却正方兴未艾。在一九一三年夏秋之际，豫南一带比较著名的农民武装，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传心等，各率党羽与之合杆”；^③率有二千多人的邓县农民军首领“孙玉章为之响应”。^④而各地贫苦农民，更是成群结队的加入白朗起义军的行列，甚至有“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妇勗其夫，其不肯为匪者，妻室恨其懦，其乐为匪者，父兄夸其能。”^⑤因此，到一九一三年冬，白朗起义军已迅速发展 to 万余众，成为当时继续抗敌并震惊中外的一支革命生力军。

二、东西两次进军的目的

一九一三年底到一九一四年夏，白朗起义军曾有两次长途进

① 《张镇芳存札》1913年7月13日余嘉德致张镇芳条陈。

② 《民立报》1913年7月14日、16日。

③ 1913年7月5日雷震春致陆军部报告。

④ 《张镇芳存札》1913年9月×日吕调元致张镇芳函。

⑤ 《时报》1913年12月2日。

军：一次向东，到达安徽的六安、霍山一带；一次向西，直至甘肃的泯、洮等地。白朗起义军为什么要作这两次进军呢？我认为：向东进军，是企图和“二次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皖、苏等地的残存力量联合起来，重新掀起反袁斗争的高潮。向西进军，则是为了找寻根据地，积蓄力量，和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长期对抗。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旬，当白朗率众由湖北枣阳重返河南宝、鲁一带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由于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从北京的国会到河南的省议会，以及各地大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对张镇芳的“剿匪不力”大加指责。对此，袁世凯严令张镇芳等限期把白朗军全部剿灭，否则撤职严惩；另一方面，“二次革命”失败，使得敌人可以集中更多兵力去镇压白朗军。于是恼羞成怒的张镇芳，便会同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陆军第一师师长张锡元、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南阳镇守使田作霖，以及旅长王毓秀、吴庆桐，张敬尧等，紧急策划了一个“分段负责，四面夹击”的“围剿”阴谋，发誓要在一个月之内，把白朗起义军全部消灭在宝、鲁西部一带的山区。^①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投入到白朗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议白朗迅速离开河南，“直往安徽，下至南京，举黄兴为大元帅”，“谋据长江中心，上窥武汉，下图皖、赣”，^②联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皖、苏等地的残存势力，重新开展反袁斗争。白朗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率军东进。

一九一三年底，白朗率众万余，战马千余匹，举起“中原扶汉军大都督”的旗帜，很快穿越京汉铁路，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等地。到一九一四年一月下旬，起义军又攻克安徽的六安、霍山等地。由于沿途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会党、变兵等踊跃参加，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二万余众，“共分四十个大队，每大队约五百人”。^③声势越来越大。

① 1913年11月26日张镇芳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

② 《白狼猖獗记》，见《时事汇报》第3号《纪录一》，1914年2月出版。

③ 王仲霖：《麻黄支防匪记》（稿本）。

当白朗起义军由河南向安徽进军时，残存在皖北各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据安徽都督倪嗣冲事后给袁世凯、参陆两部的几次报告中说：“含山乱党巨魁孙汉武、范加才等，去冬在南山一带啸聚，接济乱党。……又派刘大全到白‘狼’处接洽，许为内应，未能得手”。又说：“去冬白匪窜扰六、霍，舒城巨匪韦道应、乔三勾结数百人，乘机响应。……后更延及桐城、庐江、合肥等地，势焰日炽，几成燎原”。其余，如寿县的王如金、凤阳的常金汉、涡阳的黄二成、亳州的王金香，以及颍州大刀会首领刘钦鉴等，都曾“受白狼密约，纠结起事”，各有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①但这些武装，都未能和白朗起义军会合，便被敌人镇压下去了。

白朗原打算在安渡过旧历年之后，便“出发安庆，直下长江，攻取南京”，^②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共图大举”，以实现这次东进的目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形势迅速的变化，决定了白朗东进的目的不可能实现。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如孙、黄、柏〔文蔚〕、李〔烈钧〕等，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都已相继逃往国外，白朗想找他们联合是不可能的。虽然皖北各地一些下级革命党人曾起来响应，但势力很小，很快都被敌人镇压下去了。而江苏等地的革命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这不能不使白朗感到很大的失望。另一方面，由于白朗起义军打出河南，迅猛发展，中外反动派大为震动。反动头子袁世凯急忙调令中央和临近各省的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赶来镇压；并把“中外攻击甚力”的张镇芳撤职查办，改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指挥北洋陆军精锐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以及豫、鄂、皖、苏等省地方军队数万人，进行四面“围剿”，企图把白朗起义军聚歼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③又命令长江舰队“严密防堵江面”，阻止白朗起义军渡

① 1914年4月25日、5月15日、9月14日倪嗣冲致袁世凯、参陆两部报告。

② 吕咨予：《白狼扰鄂记》第39页，民国五年四月出版。

③ 1914年2月12日段祺瑞致袁世凯电。

江南下。同时，英、美、俄、法等帝国主义驻京使馆，也纷纷派遣武官赶到河南战区，以“观战”为名，参予镇压白朗军的罪恶活动。俄国还派遣飞行员康士坦丁驾机对起义军进行侦察。^①一场中外反动派共同策划的大“围剿”开始了。

在这危急之中，白朗和他的将领们清楚地看到，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合已经无望，再继续向已有重兵戒备的江南进军没有必要了。必须迅速冲出敌人的包围，保存实力，才能和敌人继续战斗。一九一四年二月下旬，白朗率众在豫、皖交界的叶家集一带，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打垮王占元两个团的阻截，突破重围，日夜兼程，经光山、罗山，由信阳以南的柳林越过京汉铁路，迅速进入豫、鄂交界的山区，使中外敌人的“围剿”阴谋彻底破产。

白朗起义军东进的目的未能达到，说明当时农民阶级虽然希望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并争取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来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但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弱，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去真正发动和领导农民这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白朗这支农民起义军，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孤军奋战了。

一九一四年三月八日，白朗起义军一举攻克湖北商务重镇老河口，缴获了大批的枪枝弹药，使部队暂时得以补充和休整。但这时起义军面临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今后怎么办？是像过去一样到处攻城掠地，随得复失的“流寇式”作战，还是建立一块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呢？

从当时的形势看，起义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包围，但段祺瑞所指挥的数万反动军队，都还麇集在豫南和皖、鄂边境一带，如果起义军仍按老办法继续在豫、鄂一带流动作战，敌人就会很快的布署新的“围剿”。在敌我力量悬殊而又无根据地可以固守的情势下，利钝显判。因此，赶快杀出河南，寻找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地，就成为白朗军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了。这时，留在白朗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向白朗提出

^① 《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45页。又见《神州》1914年第1卷第2册所载“剿‘狼’之飞艇”照片。

由陕入川，夺取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作根据地的建议。^①白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立即作出全军西进，相机入川的战略决策。

三月十日，白朗率众离开老河口，十四日攻克豫、陕交界的荆紫关，打开了进入陕西的大门。白朗这时把全军分成前、中、后三军，每军又分若干队。以原陕西陆军第一师团长王生岐（该团因响应“二次革命”，为袁世凯所不容，被迫投向白朗起义军）为前军总司令，率所部为全军先导。由于该团装备较好，地理、敌情都较熟悉，故进展比较顺利。

三月二十二日，当白朗起义军攻克商县时，陕西都督张凤翔恰率兵一旅由西安赶到，其先头部队与起义军刚一接触即遭惨败，吓得他掉头逃回西安，连忙向袁世凯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电。袁世凯一面电令豫、鄂两省的所谓“劲旅”，如赵倜、张联升、张敬尧、陶云鹤等部，速向陕西追击；一面又派军事执法处长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领北洋第七师，由北京日夜兼程奔赴西安，节制中央和地方的十多万反动军队，对白朗起义军前堵后追。

白朗率众入陕后，“起初原欲由南山（即秦岭）入川”。^②但因蜀道艰险，川军已有防备，不利攻取，遂克鄂县、周至，北渡渭水，又连克武功、乾县、永寿、凤翔等十余县城，于四月下旬由陕、甘交界的固关进入甘肃。接着，攻克通渭、陇西及甘南重镇天水，于五月七日到达甘、陕交界的徽县。白朗打算由此渡白水江，经陕西的略阳进入通往四川的大道。但因援陕川军第三师彭光烈所部已赶到略阳一带设防，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势，白朗只得率部再向东南，准备由文县的碧口一带入川，而彭光烈的军队紧紧追赶，又抢先占领了碧口，起义军先头部队与之接战失利。加之，白水江水涨，无船可渡，起义军无奈，只得调头向西北徐进。经西固、岷县，于五月二十一日抵临潭（洮州）城下。此地

^① 《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1960年1月。

^② 《白狼猖獗记》，见《时事汇报》第8号《纪录二》，1915年1月出版。

回民和藏民居多，反动的地方官绅利用民族隔阂，煽动少数民族阻击起义军，双方都受到很大损失。

显然，形势对白朗起义军很不利，必须迅速转移。但下一步往哪里去？是按原来的计划奋战入川，还是返回河南？当时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起义军中展开了争论：白朗等少数人主张“取道松潘，以至成都”，“攻破大城，即严行防守，士马庶得休息，养精蓄锐，静待时机”。^①而多数将领和士兵都表示不愿再去四川，要求立即东归，仍在豫、鄂一带继续战斗。白朗见众志成城，便决定回师东进。

一九一四年五月下旬，白朗率众一万余人，由临潭经漳县、秦安、清水等地长驱入陕。由于归乡心切，行军迅速，使追赶的敌人望尘莫及，但与堵截的敌人还是时常发生战斗，部队伤亡很大，当七月上旬由陕西进入豫、鄂交界的荆紫关时，部队已不满万人了。^②

为了避免敌人集中兵力进行“围剿”，白朗和将领们决定“分散活动”。由孙玉章带一千多人回邓县，尹老婆（尹福林）领数百人回豫、鄂交界的桐柏山区，宋老年领一千多人回鲁山，白朗自领一千多人经南召、方城回宝丰。分散活动的结果，适得其反。许多士兵携带他们在各地没收反动官府、地主财物时所分得的一点饷银、什物，纷纷离队回家探望亲人，有的竟一去不返。因此，战斗力大减，很快被敌人集中兵力各个击败。八月上旬，白朗也在临汝、宝丰交界的虎狼爬岭一次战斗中饮弹牺牲。至此，白朗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便失败了。

三、白朗起义军的性质与作用

白朗起义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在历时三年，驰骋五省的战斗中，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

^①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八。

^② 《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54页。

上，仍占有重要的位置。

首先，白朗起义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不仅提出了向封建地主阶级夺回劳动果实的“打富济贫”的口号，“所到之处皆能实行”；^①而且还到处张贴声讨袁世凯及其反动政府的布告，甚至提出要“设立完美之政府”^②的政治主张。一九一四年春，白朗起义军在荆紫关张贴布告，曾痛斥袁世凯“藉共和之名，实行专制之弊，利人民之弱，遂蓄登极之志”的野心；并指责他的政府是“神奸主政，群凶盈庭，”其罪恶“盍较满州（指清王朝）尤甚”。因此，“朗是痛心疾首，奋起坵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③“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④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实现“设立完美之政府”的主张。这个“完美”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据当时《北华捷报》记载，段祺瑞在用武力镇压白朗起义军的同时，还派了“说客”去劝白朗投降，许以“中州大侠王天纵所得利益为标准”。^⑤白朗回答说：“如果袁世凯真正的支持和维护共和国的政府，我就不独树一帜去反对他”。^⑥这说明，白朗要设立的“完美之政府”，还是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这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已深入人心。袁世凯破坏它，就不能不激起革命人民的强烈反抗。

其次，白朗起义军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也给予了打击。白朗起义军在攻克河南的唐县、潢川，安徽的六安、霍山，湖北的枣阳、老河口，以及甘肃的泯、洮等地时，都把传教士作为打击的目标，有的赶跑，有的杀掉，并把教堂焚毁。在湖北的老河口，起义军还把帝国主义的亚细亚煤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

① 《大自由报》，1914年1月18日。

② 《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52页。

③ 《白狼猖獗记》，见《时事汇报》第8号《纪录二》，1915年1月出版。

④ 王士嵩，《白匪扰害陇南见闻录》（稿本）。

⑤ 王天纵，字光复。辛亥革命前曾为豫西的绿林首领，号称“中州大侠”。辛亥革命时自称豫西都督，后被袁世凯收买，曾给陆军中将衔和京畿一带稽查长的职务。

⑥ 《北华捷报》，1914年2月14日，第458号。

美孚洋行等经济侵略机构的房屋焚毁，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穷苦人民。当时一些中外反动报纸曾报道说，白朗军到处宣传“传教士可杀，其财产可夺”；^①“白‘狼’现有仇洋性质，以残害洋人，毁其财产为宗旨”。^②这虽然是敌人的宣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白朗起义军确实对所接触到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给予了应有惩罚。

不能否认，白朗起义军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反帝尚带有笼统的排外主义倾向。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义军能够在反对袁世凯封建统治的同时，也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和要求。而在同时发生的“二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敢于拿起武器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但对于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的倒退行径，不仅没有提出任何反对和警告，相反，却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伟大功绩，说成是由于帝国主义“各友邦之赞助”才“藉得成功”。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严守局外中立”。^③两相对比，更可以看出，白朗起义军在当时既反封建，又反帝，是非常可贵的。

白朗起义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先后攻克过五十多座县城，仅县知事一级的地方官，除坚决与起义军为敌，被起义军击毙或捉住杀掉的以外，其余或“闻风而逃”，或“开城迎降”，事后被革职查办的就有三十余人，致使袁世凯政权下的数省几十县的封建统治秩序一度陷于瘫痪。

袁世凯反动政府为镇压白朗起义军，曾先后调动了中央的北洋军和豫、皖、鄂、陕、甘、川等省的地方军达二十余万人，更换了张镇芳、段芝贵、段祺瑞、陆建章等好几个“统帅”。而军费的开支，仅民国三年一月至六月的半年之内，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就达两千多万元。^④可见，袁世凯多次发出“劳师糜饷，貽笑中

① 《时报》，1914年4月1日。

② 《亚细亚报》，1914年2月1日。

③ 1913年7月17日，讨袁长江各军总司令李烈钧致各国驻华公使电。

④ 川山青次：《支那劳动者研究》，东亚实近社，大正八年版。

外”的哀鸣，并非无病呻吟，而确实是受到了“创钜痛深”的打击。

然而，袁世凯受打击最深痛之处，是使他在帝国主义主子的眼里丧失了“强人”的威信。段祺瑞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日给袁世凯的电中说：“豫匪久不灭，外人注目，吾人耻之。”袁世凯也在给段祺瑞、段芝贵等人的密电中供认：“白匪久不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殊损威信。因而近日中国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更难办，关系全局甚重”。^①对于主要依赖外债度日，没有洋大人的借款就无法维持其反动统治的袁世凯来说，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使他感到“忧心如焚”。形势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一些统治策略。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袁世凯在给各省民政长、巡按使的申令中说：“白‘狼’股匪，业经各军痛剿，溃散殆尽”，但“来珍方遒，前车可见。当创钜痛深之后，为有备无患之图，……休养生息，责在有司”。^②于是，他提出要“减免赋税，拨款赈灾”等措施，表示出对人民“让步”的姿态，妄图以此来缓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而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再次从白朗起义军的身上看到，中国广大人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这是他们妄图瓜分中国不可逾越的最大障碍。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对华外交政策之根本方针》一文中，就曾以白朗起义军为例，说明如果列强要以军事手段瓜分中国，就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样，“列强必苦于奔命。”“综合计之，将无所得。不惟无得，且受损焉。”最后他得出结果说：“而以军事手段，统御四百兆之人民，正属非常之难事，此欧美人忧虑之所在”。^③这说明，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清楚知道，要想随便瓜分中国而不受到惩罚，是绝对办不到的。

① 1914年3月21日，袁世凯致段祺瑞、段芝贵等密电。

② 《群强报》，1914年8月16日，由国务卿徐世昌签发的申令。

③ 《雅言》，1914年第3期，第71—72页。